

美国动态

(半月刊)

2019年8月1日 (第196期)

内部交流 仅供参考 请勿引用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布鲁金斯出台报告衡量中美“脱钩”的风险

中国并不是心怀修正主义的秩序破坏者，只是想确保其在全球规则制定中有话语权。对于美中两国而言，耐心地重建基于规则的秩序仍是唯一可靠的前进道路。

美智库：煽动性言论只会加速美国移民危机

要想更好地管控移民危机，美国必须与其他富裕国家展开合作，加强在中美洲和中非等地区的投资，改善这些地区的治理、安全和经济发展

中美关系

特朗普会见美科技企业高层共商华为问题

彭博社网站 7 月 23 日载文称，美总统特朗普 22 日与科技行业领袖举行了会谈，这意味着美国在放宽对华为的销售禁令方面又迈出了一步。

会谈的大多数受邀者都是华为的技术供应商，包括谷歌、思科、英特尔、高通等公司的 CEO。白宫发言人贾德·迪尔（Judd Deere）称：“科技公司的 CEO 们强烈支持总统的政策，包括对购买美国电信设备以及与华为做生意设置国家安全限制。”

不过，芯片制造商表示，对美国国家安全而言，全面禁止与华为做生意可能弊大于利。这些公司向华为供应的许多零部件很容易从其他国家的公司获得，如果被禁，将危及它们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进而降低它们的收益，而这将对美国维持在半导体领域的领先地位有重大影响。美光公司首席执行官桑杰·梅赫罗特拉（Sanjay Mehrotra）说：“开放和公平的贸易对美国维持技术领先地位至关重要。”

分析称，此次会晤可能会缓解中国的担忧，但美政府和国会中有人反对放松任何针对华为的限制措施。许多立法者包括共和党内的鹰派人士都主张彻底脱钩供应链，切断华为与美国零部件的联系。参议员汤姆·科顿（Tom Cotton）等称：“我们越来越多地了解到华为是一个什么样的邪恶角色。”

美中两国应做更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网站 7 月 24 日登载该智库高级副

总裁马修·古德曼 (Matthew P. Goodman) 的文章称, 美中两国需要做更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 管控分歧, 扩大合作。

文章称, 从某种意义上说, 美国和中国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带来的繁荣中获益最多, 然而, 就目前全球经济秩序的紧张局势而言, 两国应负的责任也最大。双方负责任的做法是停止伤害, 更好地管控分歧, 寻找新的合作领域。

第一步是停止伤害。美中应该给针锋相对的贸易升级降温, 减少由此带来的不确定性。美国应从指责多边机构转向对这些机构进行建设性改革, 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合作。北京应减少有害的产业政策, 消除市场竞争的障碍, 提高“一带一路”的投资标准。

两国应更清晰地界定不可避免的竞争领域。目前双方的互信太低, 几乎以战略竞争视角来看待对方的一切行为。当前围绕关键技术展开的竞争是双方分歧最大的经济问题, 摩擦不可避免, 但两国应该努力给其他风险不那么高的问题降温。

处理现存分歧也需要努力和克制。双方应明确各自的红线, 以透明的方式维护各自利益, 加强各层次定期会晤, 探讨和解决分歧。华盛顿应有针对性地利用其投资筛选和出口控制机制来保护相关技术, 同时保持投资和创新的开放氛围。北京应该采取更透明的行动, 而不是使用非正式、强制性工具。

最后, 双方都应加大国内政策力度, 以增强本国经济, 为更健康的竞争创造条件。对美国来说, 这包括投资国内基础设施、21 世纪劳动力的技能和基础研究。对中国来说, 这意味着继续推进改革开放。

美学者：美中发展合作前景不佳但仍有希望

布鲁金斯学会网站 7 月 25 日登载美国克莱蒙特·麦肯纳学

院凯克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主任裴敏欣的文章称，若当前美中紧张局势持续升级，美中战略竞争很可能成为 21 世纪上半叶的地缘政治特征，中美发展合作的前景虽不理想，但也并非毫无希望。

文章认为，两国的合作前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以下四方面：第一，是否涉及具体的地缘政治敏感性问题？如果相关问题没有地缘政治敏感性，中美两国则更有可能开展合作，譬如卫生保健与传染病。第二，是否涉及国家关心的地缘政治重要性？两国更有可能在安全或经济重要性较低的国家开展合作，且更有可能在亚洲与北美之外的国家开展。第三，是否存在利益重叠？美中更可能在拥有共同利益（安全、稳定和投资等）的国家就发展援助进行合作，如阿富汗、索马里、苏丹与南苏丹。第四，控制美国行政部门的政党。与民主党相比，共和党政府与中国在发展援助、全球公共产品以及气候变化问题上合作的可能性更低。

文章称，中美之间确实存在发展合作的潜在领域，但可能性是有限的。无论美中发展援助政策如何变化，两国都将陷入敌对共存、互不妥协的地缘政治竞争格局，而发展中国家将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被夹在两个经济巨人之间，这无疑是 21 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悲剧。然而，这似乎正是当今世界面临的发展趋势。

美学者：为何“恐华共识”令人担忧？

《华盛顿邮报》网站 7 月 25 日登载塔夫茨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丹尼尔·德雷兹内（Daniel W. Drezner）的文章称，华盛顿鹰派正形成恐惧中国的共识，情况令人担忧。文章摘要如下：

精英阶层和公众在对华问题上的差距似乎正在扩大。抨击中国是少数几个在华盛顿和 2020 年竞选活动中得到两党支持的活动之一。然而，选民对中国威胁的担忧要小得多，他们更关心恐

怖主义等问题，而非任何大国竞争。调查显示，即便是当前支持对华贸易战的群体，也只是希望这种压力能促成更好的贸易协议。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精英阶层的共识主要由外交政策专家而不是中国问题专家达成的。

在对华问题上，应记住四点：首先，非常肯定的是，华盛顿的大多数对华鹰派都高估了中国相对于美国的实力。中国无疑是个经济大国，但其拥有的结构性力量远不及美国。夸大中国实力是进一步加剧太平洋两岸误解的一个“好”办法。

其次，对华鹰派低估了对华强硬的成本。除了贸易战的代价，中国对美直接投资也在枯竭。若鹰派人士想说，为维护国家安全，即便要为脱钩付出代价也是值得的，那么应该就此展开辩论。

第三，对华鹰派需要彻底考虑这种新的“红色恐怖”政策。如果真的认为中国和美国对等，那就意味着回到了两极时代。这需要吸引尽可能多的盟友站到美国一边，让美国的治理体系成为其他国家的榜样。而特朗普政府正在做完全相反的事情。

最后，支持维持现状的人也需要作出更好的回应。一些人不同意对中国采取全面强硬的态度，但他们似乎也认为需要对现状进行调整。主张继续与中国开展贸易和交流的人还需要说明，这种做法迄今带来了什么好处，以及将来会带来什么好处。

布鲁金斯出台报告衡量中美“脱钩”的风险

中国并不是心怀修正主义的秩序破坏者，只是想确保其在全球规则制定中有话语权。对于美中两国而言，耐心地重建基于规则的秩序仍是唯一可靠的前进道路。

布鲁金斯学会网站近日登载该智库约翰·桑顿中国中心高级

研究员乔纳森·波拉克（Jonathan D. Pollack）和杰弗里·贝德（Jeffrey A. Bader）共同撰写的报告，评估了中美“脱钩”存在的风险，并认为对于华盛顿和北京来说，耐心地重建基于规则的秩序仍是唯一可靠的前进道路。

近年来，美国尤其是其精英意见群体对中国的敌意不断加深。虽然这部分是由于中国的行为和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引起的，但这种思维的转变也反映出，美国对中国崛起为全球大国产生的影响深感不安。对许多人而言，决定性的问题不再是如何处理与中国的关系，而是如何抵消并（如果可能的话）阻碍中国迈向大国地位。一些悲观的评估认为，中美之间的权力转移证明两国正在“脱钩”并进行战略分离。

美国人对中国的不满往往更像是夸张的描述，而不是理性的、基于事实的评估。支持中美战略分离的人可能希望世界其他地区在全球经济未来中没有发言权，但这种想法不过是妄想。中国并不打算屈服于美国的意志，也不会让本国的长期发展顺从于反复无常的美国。

中国邻国和美国亚洲盟友的回应也至关重要。所有国家，特别是中国的邻国，都了解与中国维持长期关系的重要性。他们与中国的经济未来紧密相连，不希望在贸易战和技术壁垒之争中“选边站队”。贸易战对中美两国和东亚的影响日益显现，很多东亚国家（包括美国的主要盟友）都是日益紧密的地区供应链上的关键节点，他们害怕卷入日益加深的科技和贸易分歧。他们也不会轻易原谅美国干扰供应链的贸易行为，因为这将削弱其经济发展。

目前，地区供应链、双边贸易和投资日益一体化，中国和邻国以及欧亚大陆各国的相互依赖加深。中美隔阂加深可能会引发未来数十年的政治和经济对抗。特朗普政府似乎认为将中国视为

敌人能够保护美国的利益，但是其几乎并未就此举的代价和后果咨询美国亲密盟友和伙伴的意见。更大的风险在于，双方疏远和对立将主导亚洲的经济和政治前景，但这不仅不会抑制中国发展的决心，反而可能引发美国和中国的邻国不想看到的结果。

中国并不是心怀修正主义的秩序破坏者，只是想确保其在全球规则制定中有话语权。保护和更新国际秩序应是美国对华战略中的一个必要条件。更为重要的是，美国需要首先解决本国政治、基础设施和社会领域的问题，譬如解决分裂的国内政治，缓解全球化在国内产生的负面影响。同时，扩大市场准入，促进与中国的学术科技交流；鼓励中国开放自己的数字市场，建立开放的数字世界；欢迎中国学者和学生来美，传递美国价值观；捍卫美国在亚洲的盟友，同时不让北京感到威胁，并避免无端将中国当作“替罪羊”。如果延续冷战心态，美国便无法实现上述目标。

美国外交

美媒：利用美国进出口银行扩大美全球影响力

《国家利益》期刊网站 7 月 15 日载文称，美国应重新界定美国进出口银行（EXIM）在美国外交政策和国防中的作用，以应对中国给美国全球地位带来的挑战。

中国积极利用关键行业，向战略盟友和合作伙伴提供军民两用的出口和基础设施融资，以将这些国家与北京及其利益联系在一起。而美国通过软实力影响全球政策的承诺却在萎缩，体现在美政府不愿利用对外军售和直接商业销售项目，在竞争对手瞄准的地区增进美国利益。这使美国在与中国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美国必须意识到中国的威胁，并利用一切可用的经济工具促

进国家安全，如 EXIM。目前，该银行目标仅仅是减轻美公司向海外出口商品的风险。美政府必须重新界定 EXIM 在外交政策和国防中发挥的作用，将其作为一种战略经济工具，以增强美国在海外的长期利益。将支持国防优先事项和提高投资纳入其目标，不仅能促进国防产业的发展，通过出口融资和潜在的研发投资提升美国的贸易竞争力，还能在美国创造就业。

美国还必须以新的方式利用 EXIM 来增强全球影响力，譬如，利用 EXIM 的资金支持美企在发展中国家建设基础设施和其他建设项目中使用美国材料，以实现安全和国防相关目的。从短期和长期来看，重新定义 EXIM 的使命不仅有助于抵御中国的扩张，还能促进创新和企业发展。

美国应重新考虑对盟友的承诺

卡托研究所网站登载该智库高级研究员泰德·盖伦·卡朋特（Ted Galen Carpenter）的文章称，延伸核威慑可能比任何人认为的都更加危险，在东亚和中东的延伸威慑给美国带来了巨大风险，因此，美国应该重新考虑其对盟友的承诺。文章摘要如下：

华盛顿显然对朝鲜和伊朗的核野心感到担忧。但事实上，只有当一个国家的政治领导人愿意在国家和个人层面自杀时，才有可能使用核武器。没有证据表明朝鲜或伊朗领导人愿意这样做。但如果美国坚持继续为其在东亚和中东的盟友以及安全仆从国提供保护，风险因素将会上升。

鉴于朝鲜半岛的政治分裂及在过去 70 年中的紧张局势，朝鲜及其邻国爆发武装冲突的危险始终存在。由于对首尔和东京的安全保证，美国可能卷入这样一场冲突，并最终可能导致朝鲜对美国本土发动核攻击。

在中东，类似的风险也正在增加。美国愚蠢地卷入了伊朗与以色列以及沙特阿拉伯等主要阿拉伯国家的纷争之中。但和朝鲜一样，拥有核武器的伊朗对美国本土发动突然袭击的可能性非常小。更大的危险是：德黑兰与其一个或多个对手之间的战争逐渐失去控制，而由于对以色列或沙特阿拉伯隐含的安全承诺，华盛顿被迫卷入其中。

华盛顿应重新考虑对盟友的承诺，并告诉盟友不愿再承担风险。这些盟友将决定如何采取更可靠的安全政策。简言之，美国需把风险转嫁给在威慑朝鲜和伊朗方面具有更直接利益的国家。

美智库：美印如何改善贸易关系

美国大西洋理事会网站 7 月 16 日登载该智库南亚中心高级研究员、前美国助理贸易代表马克·林史考特 (Mark Linscott) 等撰写的报告称，美国和印度的贸易关系正处于岔路口，两国应将管理目前的贸易紧张局势作为优先事项，不断构建互信，并进行建设性接触。文章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管理目前的紧张局势，并达成初步协议。美印双方应尽快回到谈判桌前，设法达成一项初步协议，恢复美国对印度的普惠制 (GSP) 优惠，并解决导致 GSP 审查的问题。

第二，审查并改进制度基础。与美贸易代表办公室相比，印度商业和工业部缺乏协调政府各部门贸易政策的能力。印度应探索建立特定的贸易骨干队伍，负责制定贸易政策和进行贸易谈判。

第三，延续近期的成功合作。美印联手促进世贸组织《贸易便利化协定》落实，是两国在争议领域成功合作的典范。两国应在知识产权保护、监管连贯性、构建互信等议题上展开类似合作。

第四，探索达成市场开放协议的机会。双边贸易协议不应仅

限于管理紧张关系和促进合作项目，而应朝着签署双边贸易协定的方向迈进。其他探索还包括达成产业监管协议。

第五，向着美印自由贸易协定的方向迈进。从长期来看，美印应在合适时机开始就自由贸易协议开展探索性讨论。

克制的外交政策不等于孤立主义

《外交政策》期刊网站7月22日登载哈佛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的文章称，“离岸制衡”策略的批评者称，美国若采取更为克制的外交政策，等同于孤立主义，将增加不安全因素，这些批评者存在以下误解：

误解一：“离岸制衡”支持者等于孤立主义者。事实上，几乎所有支持克制外交政策的人都明确表示，美国应当在经济、外交甚至军事层面上与其他国家开展积极接触。

误解二：“离岸制衡”需要完美地预测威胁。需要牢记的是，发现潜在霸权通常十分容易，更重要的是，必须权衡反应不足与过度承诺分别带来的风险。

误解三：如果美国退出，竞争对手将填补这一空白。这种担忧通常夸大了美国在过去实际拥有的影响力，也夸大了其他国家在未来发挥类似影响的能力。

误解四：“离岸制衡”者不在意美国价值观。促进自由价值观的最佳方式是树立榜样，用美国的权力、财富与好运，创建一个公平繁荣的社会，促使其他国家以自己的方式效仿。

误解五：“离岸制衡”将加速核扩散局面。无论美国采取何种战略，一些国家都有可能获得核武器。

误解六：当“深度参与”的成本较低时，就没有必要采取克制。花在“深度参与”型外交政策上的每一分钱，都可以花在基

础设施与教育上，这才是未来繁荣与实力所依赖的基础。

误解七：“离岸制衡”将带来第二个希特勒。可悲的是，无论美国如何部署和使用其军事力量，冲突和战争总是可能发生的。

更为克制的外交政策不会确保和平或繁荣，也不会让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免于面临艰难选择，但克制的外交政策能避免近年来动摇美国地位的错误行为，并为未来的长期投资腾出必要的资源。

“英版特朗普”约翰逊与特朗普的真假“友谊”

近日，英国前外交大臣、“脱欧”强硬派人物鲍里斯·约翰逊接替特蕾莎·梅出任英国首相。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赞约翰逊是“真正的好人”。让特朗普不吝赞美之词的约翰逊真的是“英国特朗普”吗？

特朗普在华盛顿举行的美国青少年行动峰会上说：“他们在说‘英国特朗普’。他们叫他英国特朗普，人们说这是好事。他们喜欢我在那边。这就是他们想要的。这正是他们所需要的。”约翰逊本人也表示，期待与特朗普合作。约翰逊的父亲斯坦利·约翰逊 (Stanley Johnson) 7 月 23 日在接受 CNN 采访时表示：“他们的发型一样，我想他们会相处好的。”但他也补充道：“我们必须小心，不要过于盲从美国。”

不过，两人的关系之前可并不和谐。据报道，约翰逊是第一个公开宣称特朗普不适合当总统的英国高层政客。2015 任伦敦市长的约翰逊称：“我不去纽约某些地方的唯一原因是，有可能会遇到唐纳德·特朗普。”当特朗普提出“禁穆令”时，约翰逊称其“完全是一派胡言”，“我认为唐纳德·特朗普显然是疯了”。

除了特朗普本人认为约翰逊与自己相似，美国媒体也经常将两人放在一起。首先，两人的外型相似，都有一头金发，就连约

约翰逊也表示自己曾在纽约被误认为是特朗普。两人的经历也有相似之处，特朗普曾是电视真人秀明星，而约翰逊曾是《泰晤士报》驻欧盟的记者，而后在《每日电讯报》开设自己的专栏。而且两人都深谙“博眼球”之道，常常语出惊人。

两人都持有一些“非正统”的政治立场，在某些议题上存在共鸣，二人都发表了诸多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恐伊”的言论。尽管如此，两人都不持强烈的政治观点。在过去 35 年里，特朗普五次改变了他对共和党的忠诚，而约翰逊曾向一位报社同事表示，除了“反对欧洲和死刑”，他没有任何政治观点。

然而，也有诸多分析认为二人大不相同。首先，不同于特朗普是反建制派，约翰逊反对建制派，但也是建制派的代言人，比特朗普要保守得多，在政治和社会方面，他都受到英国特有的、保守的精英主义教育浸染。英国查塔姆研究所专家莱斯利·文贾穆里(Leslie Vinjamuri)说：“鲍里斯自始至终都是圈内人。”其次，二人对移民、穆斯林的看法不同，而且约翰逊不是经济保护主义者。约翰逊认为，英国“脱欧”的主要好处之一是，将让英国经济向全世界开放。最后，与特朗普不同的是，约翰逊需要团结他的国家。约翰逊无法仅靠迎合其选民而生存，如果他想完成“脱欧”，必须赢得各个政治派别的支持。

约翰逊是否会进一步推进英国与美国的盟友关系？在伊朗问题上，美英两国对“极限施压”的态度大相径庭。当特朗普宣布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时，英国与法、德国一起，制定了保护协议的计划。《纽约时报》称，如果特朗普与伊朗开战，约翰逊试图部署军队与美国并肩作战，肯定会遭到英国公众的强烈反对。在中国问题上，美国此前要求英国禁止华为参与建设其 5G 网络，但梅政府并未响应。约翰逊 23 日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表示，英国政府将非常“亲华”，对“一带一路”倡议非常热情。

预计特朗普将推进与英国达成自由贸易协定。但考虑到“脱欧”问题的高难度和复杂性，约翰逊未来几个月或没有时间关注其他问题。曾在奥巴马政府担任副国务卿的温迪·舍曼(Wendy R. Sherman)说：“短期内什么都不会发生，特朗普和约翰逊可能一起开创了发型的新潮流，但这并不能恢复一种‘特殊关系’。”

美国政治/其他

美专家就如何确保 5G 网络安全建言献策

美国外交学会网站 7 月 15 日登载耶鲁大学蔡中曾中国中心执行主任罗彬(Robert Williams)的文章称，5G 网络可能革新数字经济，同时也可能给网络安全带来重大挑战，美政策制定者应采取举措应对该挑战。文章提出以下建议：

在技术方面，网络需要构建内在弹性，即能够隔离和抵御任意单一设备的攻击。如有可能，应使用多个供应商提供网络。同时，美国应与盟国和合作伙伴密切合作，共同制定基于风险的供应链完整性通用准则，以减少网络设备出现漏洞的情况。

监管政策应注重透明度和市场激励。联邦通信委员会(FCC)应要求制造商公布确保物联网设备安全的最佳实践，在服务供应商根据最佳实践运作网络的前提下发放频谱许可证。FCC 应与国防部及其他机构合作，提高美国公司在塑造 5G 生态上的竞争力。

改善法律责任制度以提高私营经济的网络安全。通讯产业应制定执行标准，以为法院处理网络安全侵权案件提供标准，并为保险市场为网络风险定价提供基础。

美国应在制定全球规范和增加美国网络安全利益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并在多边贸易谈判中增加有关基于风险的网络安全条

款，应致力于确保美国网络安全和促进美国技术的发展。

特朗普所谓的“关税带来政府收入”有悖事实

《华盛顿邮报》网站7月16日登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查德·鲍恩（Chad P. Bown）等人的文章，反驳了特朗普所说的“关税是美国政府的巨大收入来源”。

第一，98%的美国政府收入都来自非关税来源。2018年，特朗普对近500亿美元的钢铁和铝进口商品、25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征收额外关税，仅使联邦收入中关税所占份额由1%增至2%，其他收入则皆来自个人和公司所得税以及社保和退休收入。

第二，1914年以来，关税从来不是美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美政府无法靠关税资助国防、医保和社保等方面的支出。2018年，进口仅占GDP的12.5%。而且，提高关税将抑制进口，进一步减少政府收入。

第三，相比其他形式的税收，通过关税提高收入的成本更高。进口关税通常会扭曲公司生产力和消费者购买力，损害美国就业和公司竞争力，甚至引发关税报复等负面效应。相比之下，销售税或所得税更能提高政府收入。

第四，提高关税收入引发了人们对公平的担忧。判断关税公平与否的一个方法在于确定关税的主要承担者。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伤害了美国企业、农民的利益，增加了其生产成本，且最终以牺牲美国消费者为代价。

第五，当今世界，依靠关税收入的主要是贫穷国家。与其他税种相比，进口关税低效且不公平，无法为政府筹集足够资金。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也从未依赖关税作为政府收入主要来源，只有那些极为贫困的国家才被迫依赖贸易税实现增收。

“道德市场观察人士”或将成为特朗普连任的障碍

《国会山报》网站 7 月 21 日载文称，特朗普总统的连任竞选命运正掌握在一个摇摆选民群体的手中，他们受益于特朗普任内加速发展的经济，却并不认可特朗普的其他表现。这意味着，尽管经济好转，特朗普仍面临艰难的竞选之路。

“道德市场观察人士”（moral market-watchers）代表了一个强有力的摇摆选民群体，他们大多是住在郊区、生活富裕，主要是年轻男性，对经济形势感觉良好，但实际上并不喜欢总统。对于共和党人及特朗普来说，这些选民是一个棘手的挑战，因为在 2018 年中期选举中，这些选民支持民主党候选人的比例比支持共和党高出 20 个百分点，他们将在 2020 年再次发挥关键作用。

文章称，在一般选举中，选民对经济的看法是决定总统支持率的一个重要指标，但如今，“道德市场观察人士”认为经济问题已不再突出，仅 17% 的人表示，经济表现将成为自己在 2020 年投票给特朗普的最重要因素。

对特朗普不利的是，由于美国经济好转，选民开始将注意力转向其他问题，有人甚至可能认为其他议题比经济更重要，如政府问题或领导不力等。而“道德市场观察人士”相信，民主党能更好地处理税收、医保甚至移民等问题。

穆勒国会作证的四大看点

Vox 新闻网 7 月 24 日载文称，特别检察官穆勒就“通俄”调查在美国国会作证，他并没有像某些人希望的那样释放很多爆炸性的新信息。文章盘点了穆勒作证的四大看点：

首先，穆勒在参加听证会之前制定了计划，并严格按照计划

行事。他首先向国会表明，除报告中的内容，其他事情他“无可奉告”。穆勒不断要求议员们重复问题，缓慢而简洁地作答，有时还稍显笨拙。穆勒可能显得机械而重复，但这正是他的计划。

其次，民主党希望借此找到弹劾特朗普的理由。众议院民主党的策略是让穆勒证实他在报告中的内容，以便为弹劾提供理由。然而，民主党未预料到穆勒会如此“缄默”可能是一个严重失误。

再次，共和党的策略是提高调门，以制造一些有利于共和党的“病毒式传播”时刻。共和党不断在听证会上提及“政治迫害”的观点，但问题是收看听证会的美国公众如何看待这一切。他们被民主党的阐述所说服，还是对穆勒产生怀疑才是问题的关键。

最后，穆勒认为俄罗斯才是真正的威胁。穆勒在听证会一开始就明确表示，他真正希望公众关注的是俄罗斯的干预。穆勒在回答有关俄罗斯干预的问题时，比回答有关特朗普是否涉嫌妨碍司法公正的问题时更加轻松。

美智库：煽动性言论只会加速美国移民危机

要想更好地管控移民危机，美国必须与其他富裕国家展开合作，加强在中美洲和中非等地区的投资，改善这些地区的治理、安全和经济发展。

美国智库移民政策研究所美国项目主任兰迪·凯普斯(Randy Capps)近日撰文称，美国的边境危机是华盛顿“咎由自取”，特朗普煽动性的言论只会加速美国的移民危机。文章摘要如下：

2016年总统大选期间，特朗普承诺在整个南部边境修筑边境墙，遣返所有非法移民，并限制合法移民。尽管他尚未兑现其承诺的最严苛的措施，但毫无疑问，特朗普政府已经将边境安全

和移民执法列为优先事项。

在特朗普当选后的一段时间内，其言论和政策似乎对潜在的移民产生了威慑。2017 年，美国西南边境拘留移民人数达到了 40 年来的最低点。但“特朗普效应”并未持久：截至 2018 年冬，到达美国边境的移民人数再次回升，拘留人数也迅速攀升，并在今天五月份达到了 13 万人之多，创下了 13 年以来的最高记录。

这种逆转背后的原因为何？一方面，特朗普所谓移民“入侵”边境的煽动性言论不过是向外界宣传了进入美国是何等容易。另一方面，那些原本打算暂停旅行计划的潜在移民认为更严格的措施还在后头，希望赶在特朗普政府进一步收紧政策前进入美国。

尽管中美洲以外的移民仍然仅占移民总数的一小部分，但其数量却不断攀升。2018 年 10 月至今，美国边境巡逻队已逮捕了 53000 名非中美洲（包括墨西哥、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移民，而 2018 年该数字仅为 20000 人，2017 年仅为 10000 人。2018 年，非中美洲移民主要来自印度、尼加拉瓜、巴西、厄瓜多尔和孟加拉国，其中印度移民就达 9000 人。

几乎所有来自墨西哥以外国家的儿童和移民家庭在到达边境后都会寻求庇护。这也是造成美国移民困境的原因之一：一旦移民寻求庇护，美国移民系统便会产生大量工作积压，这些移民便能在美国呆上好几年，而这又促使更多人加入移民大军。

特朗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严苛措施，但是均以失败告终。从长远来看，美国必须和其他富裕国家展开合作，加强在中美洲和中非等地区的投资，改善这些地区的治理、安全和经济发展。美国如果继续“一意孤行”，而不是展开合作，美国和移民都将付出更高的代价。

本刊所载文章的观点不代表本刊编辑部观点，仅供读者参考。

编辑部：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622弄7号社联大楼201室

邮编：200020

电话：021-33665148

工作邮箱：bianjibu@sias.org.cn